

第三章 毛澤東、鄧小平時期中共對台政策的演變

自 1949 中共建政之後，大陸情勢逆轉，國民政府(簡稱國府)遷徙到台灣之際，大陸與台灣正式分裂為兩個政治實體，相互之間因為意識型態之故，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政治制度，甚且互不往來。在形式上雙方仍是處於交戰狀態，中共認為剛到台灣的國民政府基礎未臻穩固，軍事上防禦力量也薄弱，中共意圖趁此機會以武力犯台，將在台灣的國府勢力一舉消滅。故中共此時的對台政策即是以武力對付台灣，在制定對台政策過程中，雖說中共是集體領導，然而領導人的決定卻在決策過程中有著重要份量，尤其像毛澤東極權個人領導更能代表中共建政初期的決策。

第一節 毛澤東時期的對台政策

毛澤東十分重視祖國統一大業，故而親自主導和籌畫了對台工作，兩岸的對峙和隔絕，是兩岸的中國人民都不願意看到的事情。臺灣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毛澤東是始終堅持這一點。從 1949 年來，因為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其對台政策的制定可以說是毛澤東個人的思維模式為決定的主軸。要討論到毛澤東時期的對台政策，必須由毛澤東個人的思維做一分析。

一、毛澤東的意識型態

毛澤東在中共領袖中，有其不同凡響之處：他是一個革命家，也是一個政治家(陳永發，2001：31)。早年毛澤東深受傳統文化思想的薰陶，思維傾向基本上是傳統型的，毛澤東建立了一個比秦始皇還要權力集中的黨國體制，這個政權有很長一段時間有堅固的群眾基礎，可以從社會基層汲取傳統政府無法汲取的資源，卻不會引起社會基層的反抗。

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共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革命成功的，對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國領導人仍強調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下進行。白魯恂(Lucian Pye)認為毛澤東的思想上有幾個特徵：矛盾與鬥爭、階級鬥爭和階級態

度、人類精神超越機器、自我依賴、不信任專業化知識、農村超越城市、集體超越個人(吳安家，2004：43)，這些都在毛澤東制定政策中成爲重要角色，甚至左右政策的制定。

二、毛澤東的外交思想

近代中國所遭遇的內憂外患，令當時的知識份子深切的思考到中國未來該走向何處。無可諱言的，在中國推翻帝制後，雖然號稱有一個民主中國，然而當時的中國不論在內政、外交上都呈現一片渾沌，內有軍閥的割據，軍閥們各自擁兵自重；外交上，各列強即使在中華民國誕生後仍不願意真正放棄在中國的利益，各自透過支持的軍閥對中國豪取強奪。

因此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毛澤東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便是要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必然結論，無產階級革命是國際性的事業，需要各國無產階級互相支援。要完成這個事業，首先需要各國無產階級立足於本國，依靠本國革命力量和人民群眾的努力，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把本國的革命事業做好(謝益顯，2000：9)。毛澤東一貫強調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自己找出適合我國情況的前進道路。尤其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要信任和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則，無論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取得勝利，勝利了也不可能鞏固。當然，革命和建設不是也不可能孤立於世界之外，在任何時候都需要爭取外援，特別需要學習外國一切對我們有益的先進事物。閉關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國主義的思想行爲都是完全錯誤。儘管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但在對待世界上任何大國、強國和富國，都必須堅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決不允許有任何卑躬屈節的表現。

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是從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出發，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規律，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民

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思想，創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其基本點，一是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即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動搖性的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的統一戰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並且在特殊條件下把一部分大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敵人(毛澤東，1991：663-664)。在同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時，要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實行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在被迫同資產階級、主要是同大資產階級分裂時，要敢於並善於同大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武裝鬥爭，同時要繼續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認為由於中國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反動統治階級憑藉武裝力量對人民實行獨裁恐怖統治，革命只能以長期的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中國的武裝鬥爭，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農民是無產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無產階級有可能和必要通過自己的先鋒隊用先進思想、組織性和紀律性來提高農民群眾的覺悟水平，建立農村根據地，長期進行革命戰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毛澤東的外交思想可分為：

(一)「一邊倒」聯蘇反美時期(1949-1959)

1949年中共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就認為是新中國的開始，必須要開始處理對外關係和國際事務，毛澤東在此時宣告要新中國「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這是新中國內政外交的一個總的奮鬥目標。毛澤東亦說過：「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毛澤東，1991：1465)。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上仍就存在著三種矛盾：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的矛

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謝益顯, 2000: 10), 毛澤東認為必須在中間找出一個適合新中國的正確方向, 絕對沒有第三條道路, 而做出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選擇了同為共產主義的蘇聯陣營。

1.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開始建立時的思想(1949-1950)

有了對外交陣線的掌握, 有了敵我的區分, 才可以正確的制定方針政策, 這一向是中共在制定政策的原則。毛澤東指出, 「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 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 加上黨本身的建設, 就成為革命的「三個法寶」。新中國在建立的前夕毛澤東談到了「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成了這時期外交的三大決策。

(1) 另起爐灶

毛澤東在外交上一開始就不承認國府時代的外交關係, 希望建立的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外交關係, 對當時各國駐華使節只將之以一般僑民待之, 除非該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正式的地位且與中華民國斷絕正式邦交關係, 才與之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毛澤東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 我們與外國的外交關係要建立在一個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另起爐灶」對中共的意義在於建立國際上中國是屬於獨立自主的形象, 再也不是像之前的中國在做政策制定之際都有其他國家的意見, 及摒棄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2)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毛澤東之所以提出這項決策主要的目的在於要先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餘勢力清除(毛澤東, 1991: 1468-1482), 主要是針對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時期, 與國民政府建交的國家, 這些國家有部分是不支持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要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問題。

(3) 一邊倒

中共建政後，在外交上聯合以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外交關係上也以社會主義國家為建交的對象，因為在當時與美國支持的台灣有關係。這樣的外交思考模式也影響了內政，毛澤東在經濟、政治上的制度多仿效蘇聯。

2. 去除軍事威脅和打開外交局面的思想(1950-1955)

1950 年韓戰的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 1884-1972)派兵參與韓戰與派遣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以及加強在菲律賓的駐軍，此舉中共視為美國是以韓戰為契機，預備以從三條戰線(朝鮮半島、台灣海峽、東南亞)策略向中共進逼，促使中共在外交的策略上準備在三條戰線上挫敗美國，中共也參與了韓戰，中共在此一時期的主要外交活動為抗美援朝。

韓戰爆發的原因在於南北韓之間的內戰。國與國之間在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原則之下，中共在韓戰爆發的初期亦是秉持此項原則，卻在 1950 年 6 月 27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派兵韓國，毛澤東便在一次談話中明白反對美國出兵干預他國內政的做法。當時雖然反對美國出兵韓國，不過中共並沒有採取實際的行動。在朝鮮問題上，中共的外交戰略是清楚的，對朝鮮的內政不加以干預，對美國軍隊企圖超越三十八度線以北消滅北韓，且威脅到中國的安全，中國認為必須有所行動。

1954 年在印尼所舉辦的萬隆會議，共有 29 個國家參與，周恩來在當時宣布了中共的外交原則「和平共處五原則」⁷，中共在此次會議中建立了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因當時非洲許多國家仍舊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中共鼓勵非洲國家必須民族獨立，也給予為爭取民族獨立的國家支持，為後來中共在爭取周邊國家支持之際奠定了基礎。

3. 戰後第一次出現國際和緩形勢的外交思想(1955-1958)

由 1955 年年中起，國際緊張局勢已日趨和緩，中共高層在國際形勢稍稍趨

⁷ 和平共處五原則，1953 年 12 月到 1954 年 4 月中國政府代表團與印度政府代表團就兩國在西藏地方的關係在北京舉行談判，是由中國代表周恩來在談話中提出，即包括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爾後成為中共對外政策重要原則。中共中央黨校編輯，《中共三代領導人談台灣問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北京，2001 年，頁 30。

緩時，提出了新的外交政策，不但是要觀察國際情勢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爲了爭取國內的發展，即是「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中共主張一貫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並且歡迎世界上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在和平中競賽。相對於日內瓦會議⁸，中共希望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能夠有一個集體和平，對美國希望以和平共處的原則來進行彼此間的談判，尤其是關於台灣問題。1956年6月波蘭發生了大規模罷工事件，進而演變成武裝暴亂。暴亂雖平息但卻留下了極大的影響，波蘭卻在此次罷工事件與蘇聯產生了不同的意見，蘇聯預備對波蘭進行軍事干涉。中共明確的表示反對以對付敵人的手段來解決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此舉也埋下中蘇之間的分歧。

4.中蘇出現明顯政治分歧的外交思想(1958-1960)

在此一時期中共外交策略是強調反美統戰，同時也堅持民族解放戰爭的合理性，對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進行必要的抗爭，從1958年起，中共對外活動中都會反對美國帝國主義，1955年萬隆會議後，民族獨立運動紛起，在非洲地區因爲有許多國家仍爲殖民地，所以特別在爭取民族的獨立。毛澤東認爲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反帝反殖民反侵略所遇到最大的敵人是美國，美國與被壓迫民族是處於對立的狀態⁹，甚至毛澤東在和美國對抗時說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話(毛澤東，1994：299)，可以明白的看出中共反美的立場。

中國在周邊陸上所緊鄰的國家一般而言都維持著良好的關係，到1963年，中國已經與鄰近的國家以簽訂條約或協定的方式解決邊界問題¹⁰，唯有在印度和

⁸ 日內瓦會議，即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和平問題的會議，會中出席的國家有中、蘇、美、英、法，關於朝鮮問題並未達成任何協議；關於印度問題達成了停戰協定。中共中央黨校編輯，《中共三代領導人談台灣問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北京，2001年，頁31。

⁹ 1965年1月9日與國際友人斯諾的談話中，當斯諾問：「是否可以認爲帝國主義和亞非拉的新興力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時，毛澤東並沒有否認的說：「我看美國總統也是這麼說的。」，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1994年，頁546。在第二次大戰後一直到70年代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哩，國際上存在東西陣營意識型態的對抗。

¹⁰ 中國與緬甸簽訂《邊界條約》(1960.10.1)，與尼泊爾簽訂《邊界條約》(1961.10.5)，與巴基斯坦簽訂《關於中國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其防務的各個地區相接壤的邊界協定》(1963.3.2)，與阿富汗簽訂《邊界條約》(1963.11.22)。

不丹方面沒有任何進展。不丹在對外活動是受制於印度，印度在獨立之後繼承了英國殖民時所佔領的一些西藏土地，中共曾經提出交涉希望歸還西藏，但一直沒有取得成效。到了韓戰期間，印度的策略明顯是接近西方大國，因此中國在與之交涉領土接壤問題時，更形困難。一些西藏逃亡份子紛紛尋求印度的政治庇護，中國曾要求印度取締，多次遭到印度的規避。在對印度問題上蘇聯不願意中印雙方發生戰爭，卻又在態度上傾向印度，並且在參加中國國慶紀念時，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Lhrushchev)公開指陳中國對「八二三」砲轟金門及台灣問題上錯誤的政策，此時中蘇在政治上顯然出現了分歧。

(二)反美反蘇時期(1960-1969)

在中共國家發展的模式上，中共認為自蘇聯引進的發展模式對中共並不適用。本欲透過「大躍進」來脫離蘇聯的模式，卻導致蘇聯自北京撤回大批顧問團，再加上中印問題後，令中蘇之間的利益觀點明顯發生分歧，中共自是認為蘇聯為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而要犧牲中共的國家利益。除了國家利益問題之外，意識型態的爭論也致使中蘇分裂，毛澤東對於赫魯雪夫在對美國採取「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視為是蘇聯走向修正主義的開始。

中共與蘇聯之間的關係更形惡化在於 1962 年中印第二次戰爭。中國與印度為了西藏問題再起爭端，印度以大規模軍事行動侵略中國邊境，蘇聯對此次的中印再起戰端並沒有支援中共，中共認為蘇聯在態度上更偏向印度。1968 年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發表了「布里茲涅夫主義」，即是有限主權論，指出社會主義陣營是個大家庭，有任何問題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大哥有權派兵協助解決內部問題，此為主權共享，為蘇聯派兵鎮壓布拉格反對運動尋求合理化，此舉卻加劇中蘇關係惡化。1969 年在烏蘇里江中的島嶼「珍寶島」爆發中蘇武裝衝突，這是中蘇間的邊界，雙方皆派遣部隊駐紮於此，短兵相接後，中蘇之間關係的惡化已經完全浮上檯面。

中蘇共的分裂，並未促成中共與美國的和解趨勢。1960 年代，美軍介入越戰，

中共更將美國視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帝國主義與中國安全上最大的威脅。中共不但沒有將合作夥伴由蘇聯轉成美國，因其意識型態的制約，主要是中共曾經痛罵美國為帝國主義，毛澤東無法說服人民，自己主觀意識上也不願意與美國合作；另外，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中國以革命為一切的主軸，即所謂的「革命外交」¹¹。到了1969年中共召回所有的駐外大使進行思想改造，唯獨駐埃及大使沒有召回，那是因為埃及是第三世界國家。中共在此時期，特別將外交重點放在第三世界國家，為共同反美反蘇兩大超強及其所主宰的國際體系¹²。鼓勵第三世界國家成立一個以印尼為首的新聯合國，唯中共在當時並無軍事經濟能力足以支援所有的第三世界國家獨立，並且並非所有的第三世界國家都同意反美或者反蘇。

(三)中美關係正常化(1970-1977)

此階段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論」為主要外交政策¹³，是中共反霸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意圖以第三世界為主力聯合第二世界國家打倒兩大強權，此時正值與美國關係改善之際，於是毛澤東巧妙的將美蘇霸權地位改變，試圖合理化自己新的外交政策。

首先，中蘇「珍寶島事件」後，邊境衝突接踵而來，前又有「布拉格事件」為借鏡，讓中共不僅擔心蘇聯極可能會藉著「保衛中國社會主義」之名，大舉進犯。其次，中共也認為越戰情勢的轉變，在國際權力平衡上對美國產生不利的狀態卻對蘇聯有利，美國尼克森 (Richard Nixon) 政府也有意透過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來挽回當時美國日漸失去的國際戰略優勢。隨後，1971年中國爭取重返聯合國，中共以取代案方式加入聯合國案成立，中美雙方因彼此的國家利益而改變了敵對態度。

中共在1970年代時期的外交政策隨著國際現實環境的改變以及本身國家利

¹¹ 革命外交，所指的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以個人的意識形態為外交政策的主軸，這個時期是的外交思維是充斥「解放全世界使命感」為主要思維。

¹² 黃中天、潘錫堂主編，《中國大陸研究》，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頁74。

¹³ 三個世界論，毛澤東在1974年提出，指出美國和蘇聯構成第一世界；中間的力量，例如：日本、歐洲和加拿大，都屬第二世界；中共和亞非及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則屬第三世界。

益的發展，便採取了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孤立外交政策不同的三個外交政策。

1. 中共開始與美國進行雙方關係的改善，目的就是為了紓緩日益緊張的中蘇邊界情勢。
2. 中共放棄 1960 年代的激進路線，改變支持一種比較符合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想法的國際秩序改革主義；中共取消世界革命的主張，取而代之的是在承認既有國際政經秩序的基礎下，提出全面但溫和建立國際新經濟秩序的主張。
3. 中共開始意識到經濟發展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放棄文革時期自給自足的經濟方式，主張主動與西方進行經貿往來，不過仍舊不會太過依賴外國的經濟(黃中天、潘錫堂，1994：77)。

國際的政治環境是現實的，中國加入聯合國的過程讓國際上嗅到中美即將合作的味道，國際現實迫使各國以美國馬首是瞻，認為美國的下一步極可能放棄台灣紛紛爭取與中共建立新的外交關係。

1972 年，是中共外交上成果豐碩的一年，中日建交，日本因為中國有著廣大商機與其建交，緊接著廢除台日條約，日本也承認中國為唯一合法的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順利與中國建交。緊接著尼克森訪問北京，與中國簽訂「上海公報」¹⁴(Shanghai Communique)，在上海公報中已經暗示著「一個中國原則」(one china)。上海公報的發表象徵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重要一步，標誌著兩國關係開始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也為以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和建交奠定了基礎(洪停杓、張植榮，2004：212)，但卻因為美國國會中尚有支持台灣的議員，加上中共內部的反彈，終究未能與美國正式建交。隨著水門事件(Watergate)的爆發尼克森下台，

¹⁴ 上海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同意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與台灣人民維持文化、商務、及其他非官方關係。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申上海公報中雙方所同意的原則，並再度強調：雙方希望減低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雙方均不應尋求在亞太地區或世界任何其他地區內的霸權，及雙方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此種 霸權的努力；雙方均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面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立場，中國僅有一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雙方相信「中美關係之正常化」，不僅符合「中國」與美國人民之利益，而且亦有貢獻與亞洲與世界和平之大業。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 1979 年 3 月 1 日交換大使與建立大使館，資料來源陸委會 <http://www.mac.gov.tw/index1.htm>。

福特(Gerald Ford)總統上台，然而卻因中共自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持續進行中，毛澤東認為周恩來與季辛吉的會談中犯了「右的錯誤」¹⁵，不再讓周恩來參與決策。文化大革命進入結束階段，中共高層之間的政治鬥爭仍舊持續，毛與周、鄧小平之間的鬥爭；四人幫遭到逮捕後，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的爭權。1976 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死亡，中共內部一時之間無法整合一個統一的外交政策，福特只能承繼尼克森的中國政策。

三、毛澤東時期的對台政策

中共建政初期在外交上歷經了一段艱困時期，因此在對台政策的制定上除了要顧慮到國際上的現實壓力外，還必須顧慮到中共本身的利益。所以在 1979 年之前，「解放」是中共對台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在毛澤東時期的對台政策可分為：

(一)毛澤東的對台政策—全面武力解放台灣(1949-1954)

中共在對台政策上的制定，仍舊是以馬列主義的想法為制定政策的主要觀點，將台灣視為一個「反動」的政府。首先，中共想趁國府剛剛到台灣，一切尚未進入軌道之際，以武力的方式「解放」台灣，將台灣重新納入成為新中國的一部分，真正讓新中國完成統一。基本上，由 1949 年開始中共對台的策略一直不脫「武力」，甚至到 1970 年代末，都想直接以武力的手段來完成對台灣的統一，所以中共一直以來都將台灣問題視為是內戰的延伸。

1949 年 3 月 15 日，中共新華社發表社論，社論的標題即是「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是關於武力解放台灣最早出現的言論。在「內戰延長期」之初，中共幾次對台灣發動武力攻擊，為的就是要盡快解決內戰問題，卻因為幾次的對台作戰缺乏兩棲作戰經驗與後勤補給不力，形成共軍的重挫。

¹⁵ 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對美國妥協並不等於放棄對美國鬥爭，美國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國家」，仍舊是中共「世界革命」必須打倒的敵人，目前這種「必要的妥協」，是「為了後來便於捕捉及槍斃強盜」，《1974 年中共年報》，中共研究雜誌社：台北，1974 年，頁 16。

其次，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杜魯門總統基於美國國家戰略利益，恐中共一旦對台灣發動戰爭，便會直接威脅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韓戰的爆發對亞洲來說，有其特殊意義，對台灣而言，讓台灣有一息尚存的機會；相對於日本，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個復甦的機會，因為韓戰讓美國將注意力及軍事力量轉至日本，而軍事駐地會為當地帶來周邊經濟。

最後，美國宣佈參與韓戰開始，也宣佈軍事控制台灣和台灣海峽，中共對美國直接以軍事行動干預中國內政感到不悅。中共並不認為台灣問題可以輕易的解決，中共對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至台海並恢復對中華民國政府軍援必定是反應激烈。於是在1950年8月要求聯合國命令「美國侵略軍」(指第七艦隊)「撤出台灣」，周恩來以總理兼外長的身分強調「中國決心解放台灣」。美國則致函聯合國，表明美國的行動並不會影響到台灣政治地位問題¹⁶。國際上的局勢，壁壘分明，在東西兩個陣營裡，中華民國政府因韓戰的爆發在台澎金馬穩住陣腳，中共一直將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海視為美國贊成「台灣地位未定論」。就這樣，中共一向將台灣問題視為中國內政，卻在美國的介入之下，演變成在國際上製造成「兩個中國」的台灣問題。中共在參與韓戰之際，為免兩條戰線同時開啓而出現無法應付的情況，決心集中軍事力量在打贏韓戰，武力解放台灣方針暫時被迫中止。在此時中共的對台策略，主要強調捍衛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政治鬥爭和外交鬥爭為主要方針。

1. 影響毛澤東制定對台政策的因素—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

1949年2月，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共戰事迅速逆轉，中央政府自南京遷往廣州(潘振球，1996：234)。10月1日，中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發函各國，並且宣布願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中華民國政府更在10月之後播遷至台北。美國國務院在1948-1949年間對中國的局勢感到難以掌握，於是對華政策採取模糊

¹⁶ 台北方面的反應是由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聲明，主張聯合國不應考慮「北平政權的任何申述」；周恩來等中共領導階層當時誤判美國維持現狀的基本考慮，以為美國企圖摧毀中共政權，從而認為與美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見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39年(1950)7至9月》，國史館：台北，1997年5月，頁448-449。

政策，美國部份官員亦有主張承認中共者(顧維鈞，1998：118)。所以當國府在1949年在南京移往廣州之際，雖然使館已經隨國府遷移，但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ud)卻滯留南京與中共代表接觸。惟當時國際上已經形成由美蘇兩國領導的東西兩大陣營的冷戰局勢，毛澤東乃於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強調外交政策是「一邊倒」，也就是中共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陣線。1949年8月，國務院不顧中華民國政府的勸阻，發表了《1944年至1949年的美國對華關係》(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1944-1949)，即俗稱的對華政策《白皮書》，內容強調美國過去以武力協助中華民國政府剿滅共產黨是不切實際的。中國大陸的失陷與美國無關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失敗(潘振球，1997：187-214)，此舉實有意為馬歇爾(Gen. George Marshall)調停失敗卸責，同時也與中華民國政府保持距離。

二次大戰後，美國改變與蘇聯合作的政策，改採對蘇聯進行全球性的「圍堵」(containment)，主要在遏止共產主義的蔓延，更主要的在防止蘇聯勢力的擴張，也希望中共領導者能像南斯拉夫的狄托(Josip Tito)不受蘇聯控制，自然可以阻止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展，使美國能盡全力協助歐洲(袁明、哈里·哈丁，1989：252-254)。中共政權成立後，美國國務院預估台灣陷共為遲早之事，杜魯門總統表示「台灣不是獨立的，是中國政府治下中國的一部分，而美國是繼續承認中國政府的。」(胡為真，2001：7)，美國不再捲入中國內戰中也不在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這是避免把中共推向蘇聯的一方。

中共在此時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1949)，條約以共同防禦為目的，是中共進一步為要獲得蘇聯的軍事協助，更希望在進攻台灣之時，可以得到蘇聯的支援，然而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卻未同意。1950年，美國始料未及北韓向南侵，美國認為這是蘇聯與中共在亞洲的擴張，若未予以防範亞洲恐將落入共產主義世界，同時也會危及美國的戰略及安全。美國決定以實際行動遏制共產主義的蔓

延，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遂派遣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防止中共攻台，因為台灣一旦落入中共之手等於宣告美國在琉球與菲律賓的基地也遭受中蘇的威脅，會對美國戰略產生極大威脅。在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的同時，卻也阻止了中華民國對大陸的襲擊，不過美國對於台灣的援助，卻僅止於消極地防止台灣淪陷，並未積極地想讓台灣成為反攻大陸的跳板。

2.韓戰爆發後的「中」美關係

在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之後，中共意識到美國對台灣政策的轉變。隨著中美兩國朝鮮軍事的對抗，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包括對台灣的政策逐漸成形。在美國的文件中，1951年5月17日一份名為《美國在亞洲的目標、政策和行動方針》，內容有關於對台政策的規定是，繼續第七艦隊的任務，向台灣提供軍事和經濟的援助，「阻止台灣陷落」，提高國民黨的威望和影響(陶文釗，2004：138)。更有台灣的學者提出，自此，美國的決策者才將台灣從美國的政治負擔變成政治資產(張淑雅，1981：471)，而有了想保衛台灣的決心。

美國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 1890-1969)在1953年接任總統後繼續在軍事上協助台灣，並在國情咨文中宣布將令第七艦隊不再阻止台對大陸突擊(朱匯森，1989：138-143)，也任命藍欽(Karl Rankin)為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第一任駐華大使，台北為了鞏固與美國的關係，也為了提升政府的地位，主動要求與美國簽訂一項共同防禦條約，獲美國同意，「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內容指出，中美雙方結成軍事同盟，雙方的領土被攻打，則視為本土被侵略，有義務出兵協防。美國以海峽中線為防禦區，但因金馬海岸線過長而不予以協防，也提出中華民國若要在金馬增兵需要美國同意，條約內容也間接的確立根本不可能反攻大陸(沈劍虹，1982：265-267)。

中共認為此項條約的簽訂無疑是將美國的政策由「保台」轉向積極與台灣當局合作，中共認為這直接的後果是造成兩岸關係的空前緊張(余克禮，1997：27)，中共為了表示反對中美擬定共同防禦條約，就在1954年9月砲轟金門，5小時之

內射擊了 6 千多發砲彈，與中華民國空軍正面交鋒，我空軍隨即突襲大陸沿海相關設施，台海之間的緊張情勢一觸即發，一般稱為「第一次台海危機」，引起國際上的關注，突顯了軍事防禦台灣的重要性(胡為真，2001：17)。中共認為美國為台灣提供進入國際舞台的機會，甚至該為台灣問題複雜化以至今日未能解決負起大部份責任。

(二)爭取和平解放台灣(1955-1969)

這個時期因中共內部出現許多大小政爭¹⁷，與蘇共的關係持續惡化中，加上國際因素，因為有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假使台灣受到武力攻擊，美國勢必出兵參與防衛台灣，毛澤東深諳中共的軍事力量不敵美國，因此毛澤東認為除非必要時刻，才會採取以武力方式解放台灣，否則中共將努力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毛澤東知道自己無法同時應付蘇聯和美國。

1.金門砲戰一單打雙不打

在 1954 年 12 月 2 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訂立後，中共重申「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決心解放台灣」。1955 年 1 月，中共發動陸海空三軍攻佔了大陳列島的門戶一江山，以宣示解放台灣的決心。美國第七艦隊協助撤退大陳島上的居民，間接加速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授權美國總統使用武力保衛台澎及該地區相關領土。在第一次台海危機後，中共認為以軍事行動解放台灣成果有限，因而趁著萬隆會議上所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之際，順勢提出表示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同時願意與美國就遠東及台灣問題舉行會談。中共與美國談判目的是希望美國勢力退出台灣，並獲取美國在外交上的事實(de facto diplomatic recognition)；美國談判的目的在於，藉此要求中共在台海地區放棄武力。美國所提及不在台海使用武力，就是台海中立化。

中共與美國各項談判中總是會涉及台灣問題，中共強調一貫的立場即「一個

¹⁷ 1954 年的高饒事件，高崗原為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原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先後調回中共中央任職，二人利用黨內高層在工作中的正常意見分歧，製造黨內糾紛，後毛澤東等決議撤銷兩人職務，進行了黨內的鬥爭。陳述撰稿，《中國共產黨 8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1 年，頁 284-285。

中國」，而美國和中共已坐上談判桌，不免讓人有承認兩個中國之意涵。美國始終不願意正面表態願意自台海撤軍，中共也因始終在台灣問題上沒有取得一個回應。因此中共在 1958 年後有了明確的對台政策立場，亦即「台灣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都談不上」，雙方的談判在認知上有所不同，所以談判根本無法有所進展。

中國在 1958 年調整政策，中共領導人斷定中國爭取和平的政策是失敗的。毛澤東認為美國不是尋求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和調整對台灣的政策，而是加強美國與台灣和日本的戰略關係。同時，因為蘇聯人造衛星發射成功，毛澤東認為美國是處於劣勢，更改變了社會主義在全球的發展形勢，以至於「東風壓倒西風」(姜長斌，2000：5)。此時，在外交上毛澤東將意識形態加諸於外交政策上，因此推動「大躍進」等更激進的共產主義，對毛澤東來說他認為這些外交上的情勢是有利於中國，於是決定回到「鬥爭」，再次在台灣問題上使用武力。在美國 1958 年捲入黎巴嫩危機時¹⁸，毛澤東決定了這個時候是以武力對付台灣的最佳時機，台灣有鑒於中東地區的情勢，發布了特別戒嚴令，美國也命令第七艦隊進入備戰狀態。

毛澤東藉此次機會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問題。毛澤東決定第二次砲轟金門、馬祖，目的是為了要測試美國的決心也是將國際的目光吸引過來，毛澤東決定砲打金門時說：「每天總是怕，在幹部和人民裡頭不鼓起一點勁，是很危險的。」(姜長斌，2000：56)，當時中共國內正值多項運動，毛澤東順勢動員中國人民。毛澤東對於攻打金門有這樣的考量，是要把砲轟金門、提出台灣問題和支持中東人民反美鬥爭結合起來，使兩者相互配合，互為後盾(毛澤東，1994：353)。

首次的砲轟金門持續了 10 天，達到了震驚美國的政治效應，美國得知中共在砲打金門上的態度是強硬的，因此也宣布 12 海浬領海線不得輕易越過。毛澤東在 9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現在的方針並不是即刻登陸金門，

¹⁸ 1958 年 7 月 15 日，美國以保衛黎巴嫩主權為名，出兵黎巴嫩，干涉黎巴嫩人民反對親美的政權，引發國際的關注。

而是將台灣當成拉住美國的絞索，一步步拉緊對美國施壓的「絞索政策」(姜長斌，2000：59)。中共不斷的砲轟金門之下，金門只得向台灣告急而台灣方面請求美國援助，美國和台灣方面組成聯合艦隊。毛澤東對於美國與台灣方面所組成的聯合艦隊，所下的攻擊命令是，只進攻台灣方面的艦隊不攻打美國的艦隊。毛澤東此舉除了是要試探美國參戰的決心之外，同時也是迫美國重新與中共回到談判桌上。時值毛澤東在中國實行「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推動失敗令其國內經濟困難，加上經過幾次實戰之後，毛澤東判斷美國要保台灣卻不一定要保金、馬。

緊接著毛澤東改變對台政策的方向，在戰略上也有些微改變，對金、馬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金、馬留在台灣手中，不讓美國脫身，以利於對美國的「兩個中國」政策做鬥爭，而且對金門有「單打雙不打」的作戰策略。10月6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充分利用了美國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指出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認知，可以藉由談判解決中國內部的爭端。於是毛澤東改變戰略思維，砲轟金門進入了一個以政治鬥爭、外交鬥爭為主，軍事鬥爭為輔的新階段。毛澤東甚至認為寧可讓台、澎、金、馬多留在蔣介石手中一個時期，卻絕不能讓美國拿去。

2.和平手段—「一綱四目」策略

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宣布了對台政策，認為，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裡，不可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可以等待。毛澤東甚至在接受《南洋商報》訪問時表示：「台灣如果回歸祖國，照他們(蔣介石)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國不要蔣時，蔣可以來大陸，來了就是大貢獻，就是美國的大失敗，關於軍隊的問題，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這些周恩來後來將之歸納成「一綱四目」，毛澤東一再表示，臺灣當局只要一天守住臺灣，不使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改變目前的對台政策。

1963年初毛澤東提出並由周恩來歸納的「一綱四目」和平統一祖國具體意

見，實質上就是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裡實行兩種社會制度並存的方案。「一綱」的精神就是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必須回歸祖國；「四目」實際上就是在一個國家裡實行兩種制度，亦即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由蔣決定、所有軍政及建設不足之數由中央支付、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協商解決、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團結的事(崔之清，2001：239)。

「一綱四目」實際上是毛澤東 1956 年提出的用在一個國家內實行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辦法，和平統一祖國初步構想的更具體的方案。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 50 年代中期提出、60 年代初期進一步充實了內容，從而方案化了的在一個國家裡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並存的構想，實際上就已經包含了後來在 80 年代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的基本內容(崔之清，2001：239)。

(三)外交鬥爭解放台灣(1970-1976)

毛澤東時期的對台政策，基本上一直要到 1958-1960 年這幾年來才有具體化的內容出現。1960 年代之後，因為中共內部的三面紅旗到文化大革命一連串的國內思想運動之下，對台政策在毛澤東晚期所佔的重要性並沒有勝過當時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在 1971 年中共順利進入聯合國，並取得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中共所一直強調的對台政策仍舊是以「一個中國」為主軸並開始孤立台灣。台灣在此時失去聯合國的會員資格，國際友人紛紛與台灣斷交，美國對華政策在 1970-1971 年這一段時間名義上是遵守「一個中國」，實際上是以「兩個中國」的方式來平衡對中國與對台灣關係。一直到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並與中共共同發表「上海公報」，尼克森與周恩來的會談中，承諾了對台政策五原則(胡為真，2001：49-50)：

1. 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我控制我們的官僚體系就不會再有類似「台灣地位未定」的聲明。
2. 我們不曾也不會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3. 將在能力所及範圍內勸阻日本，使其不進入台灣，也不鼓勵日本支持台獨。

4. 支持任何能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不支持台灣政府任何想藉軍事手段返回大陸的企圖。
5. 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

由於當時美國與台灣還維持正式外交關係，尤其美國國會中有許多對台北友好的人士，尼克森也特別強調不會改變與中華民國的關係。雖然尼克森對外宣稱對華政策並未改變，實際上卻悄悄的在對華政策上做了轉變，美國不再對中共政權統治大陸有所挑戰。美國政策的轉變，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挫敗，迫使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3年5月到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共實行某種形式的「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政策。北京之所以讓步，是基於安全戰略上的考量，主要是因為來自蘇聯的威脅。中共對台政策上從國際場合上孤立台灣的外交鬥爭，已經是以和平解放為其基調，但是中共從來不會放棄以武力犯台的可能性。那是因為中共一直以來都將台灣問題視為中國內政問題，不容許外國勢力干涉、介入的；中共對台灣問題有絕對的主權，要用哪一種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都是由中共決定(蔡政文、林嘉誠，1989：23-24)。這就是毛澤東對台政策維持的一個不變的基調，一直到毛澤東去世中共對台政策都不離開這樣的一個大方向。

第二節 鄧小平時期的對台政策

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可以說是思想僵化，經濟蕭條。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讓鄧小平成為西方國家眼中的務實主義者，讓中國再次走進國際社會中。改革開放，卻也讓鄧小平必須為1989年的「八九民運¹⁹」做出一個清楚的責任釐清。鄧小平的對台政策制定為兩岸之間的交流奠下一個基礎，不再只是由意識型態主導對台政策，而是從國際局勢與中共本身國家利益去制定對台政策。

¹⁹ 有關八九民運的稱謂，有稱六四天安門事件、六四事件、天安門事件多種的說法。

一、鄧小平的意識型態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就是一個工廠、一個機關、一個學校、一個商店、一個生產隊，也都要實事求是。」(鄧小平，1994：143)。鄧小平在一個沒有毛澤東的時代，揚棄毛澤東的民粹主義路線，繼續走後馬克思主義²⁰的方向，並以落實列寧主義為號召。鄧小平對列寧主義的強調，除了著重要走菁英路線以及逐步制度化，朝制度主義發展外，主要就是要求黨國機器相對於群眾要有權力的優位性。因此，列寧主義在鄧小平手中也被化約，與原始的列寧主義存在差距。因此，鄧小平是走列寧主義政治模式，不過鄧小平同時對社會理想、社會公平作了精闢的論述。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1993：373)。中國共產黨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鄧小平說：「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也就是堅持毛澤東所說的實事求是，堅持毛澤東同志的基本思想。」。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之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沒有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沒有按規律辦事。而是急於求成，提出什麼「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有的地方甚至搞「假、大、空」，使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受到極大挫折，人民吃盡了苦頭(鄧小平，1993：63)。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以實事求是為精髓、為靈魂、為核心的。

鄧小平早年留學法國，多年的國外經驗讓鄧小平不同於毛澤東的是，增加了

²⁰ 後馬克思主義所指的是，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或者在馬克思主義之外的，而是重視當代社會中各種鬥爭形式、力求在非同一性基礎上，形成民主鬥爭領導權並且拓展社會民主運動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力求連接起各種鬥爭力量，在承認現代社會構造的複雜性基礎上，反對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商品化、社會的同質化和官僚主義，推進激進民主。曾枝盛，《後馬克思主義》，台北：揚智文化，2002年，頁16-19。

鄧小平對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認識。鄧小平認為，中國應該實行對外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是由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所決定的。他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開放的世界」指的就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鄧小平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就覺察到了這種趨勢，並提出了中國順應這一趨勢的對策，即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將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之中。他多次強調，中國「要擴大開放，現在開放得不夠。」(鄧小平，1993：32)，鄧小平強調，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發展才是硬道理」。要發展，就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實行全面的長時期的經濟上的對外開放。中國長時期的封閉式發展，對國家社會影響是深遠的，無法在經濟上做到滿足人民，也無法和其他國家相抗衡。因此鄧小平要中國富起來，要中國富起來就要發展中國的經濟，要經濟上的開放必然的要借助西方工業國家的經濟實力與技術，自然必須與西方的國家改善過往劍拔弩張的關係。

鄧小平基於國家實力與發展的需要，於是主張與西方國家有正常化的關係，鄧小平在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對國際上的形勢亦有不同於毛澤東的見解。鄧小平主張愛國主義，作為「千百年來固定下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的一個歷史範疇，在不同的國家民族、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具有其獨特的內容和具體要求。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面對風雲變幻的世界，鄧小平總是把愛國主義同提高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聯繫起來，從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聚精會神致力於社會主義建設、振興中華的高度來認識。他在會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時的談話中指出：「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明白的說了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蔡娟，2003：197)堅持原則，策略靈活，在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民族尊嚴的問題上，強調要維護國權、國格。強調對來自國外的壓力，不能示弱，不怕孤立，不怕制裁，維護中國獨立自主，國家對其領土享有不受外部干涉的獨立的管

轄權是國家主權含有的重要內容之一。鄧小平在解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海峽兩岸統一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集中體現了他對這一國家根本利益的認識和處理方式。這些逐步形成鄧小平的外交思想，當然也包括對台政策的制定。

二、鄧小平的外交政策

「國家利益始終是一國制定對外政策的主要依據」，國家利益是決定國家外交政策和對外行爲的根本因素，這一點已成爲當代國際政治學者們的共識。列寧曾指出：「國家的內外政策歸根到底是由本國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李義虎，2004：702)。

中共中央黨代表大會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是鄧小平外交思想醞釀成形的一个時期。鄧小平的外交思想基本的內容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堅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爲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楊成緒，2004：1)。中國永遠不稱霸，始終與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起，爲維護第三世界國家的權益而鬥爭。這是承繼了毛澤東時代，由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中共認爲自己是和第三世界國家站在同一陣線上的，這也是基於冷戰時期的戰略思維。

(一)改革開放時代的外交(1978-1981)

這個時期是鄧小平自 1976 年粉碎「四人幫」之後，重新站上中國領導權力的位置，到 1981 年是鄧小平權力完全可以運用自如的時期。鄧小平針對第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局勢的看法是，認爲世界是以和平和發展爲主題的開放整體性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這一開放世界，明確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謝益顯，1999：34)，是各民族在經濟全球化基礎上的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統一世界。一個國家和民族要發展，就不能孤立於世界之外，否則就只能走向衰敗，因而鄧小平時期全力發展外交關係成爲其主要的重點。

1976 年，毛澤東死後，鄧小平並非即刻重回權力核心，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華

國鋒對外交上的策略是延續毛澤東時期的反蘇，中蘇關係持續惡劣下，中共選擇與美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反對蘇聯霸權主義。日後鄧小平在和華國鋒的權力鬥爭中勝出，因此 1978 年舉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訂定了國家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任務，建立一個和平有利建設的國際環境，是中共這時期最主要的外交思想。中共在此時期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隨時迫近的看法，認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發生大規模世界戰爭的可能會降低，鄧小平指出國際上能夠發動大規模的世界大戰國家來說，目前只有美蘇兩國，這兩個大國是不敢打也不能打，除了美蘇都擁有原子彈等足以摧毀對手的武器外，國際上剛剛才歷經了第二次大戰以及冷戰的威脅，各國之間都以和平為主要外交策略，不再希望揚起戰端，因此美蘇兩國誰也不願意揹上開啓戰端的責任，如此一來誰也不敢先動手。

隨著鄧小平在 1978 年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策略，開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做一個符合中國發展方向的調整，將重心放在國家現代化上，鄧小平看到國際之間普遍要求和平的態勢，便利用這個戰略間歇期全力發展中國(鄧小平，1993：233)，究竟要將中國帶往何處，鄧小平有其定見。他認為中國應該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但首先要將中國自己的事先辦好，自己發展起來，才能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這些想法都涉及到鄧小平對中國實力的認知。鄧小平認為中國是大國也是小國，雖然中國有獨立的外交、眾多的人口、廣大的土地，卻因為人均產值處於低水平的發展國家，所以是小國也是大國，暫時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及貢獻是有限的(鄭宇碩，1999：12)。不過鄧小平改變中國的外交思維，主張將中國帶入國際社會中，要讓中國走出去，因此中國開始積極的走向世界，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開始到外國參訪，提高中國國際能見度，在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對外交往出訪的次數上，見表 3-1：

表 3-1 1976-1980 年中共高層出訪次數

年 份	總 出 訪 次 數
1976 年 7 月 1 日-1977 年 6 月 30 日	331 次
1977 年 7 月 1 日-1978 年 6 月 30 日	576 次
1978 年 7 月 1 日-1979 年 6 月 30 日	462 次
1979 年 7 月 1 日-1980 年 6 月 30 日	487 次

資料來源：黃一兵，「鄧小平與新時期改革事業的啓動—以對外交往的轉型為線索」，《中共黨史研究》，北京，2004 年，第 4 期，頁 31。

由(表 3-1)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對外關係上改變的迅速，中共的國家發展也因為對外關係的改變而有了新型態的發展。

第二次大戰後，美國出現了因中東石油危機而導致其國內通貨膨脹，執政的共和黨因尼克森水門案而影響聲譽，加上國會由民主黨控制，致使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贏得總統大選。卡特對外交展現濃厚的興趣，派任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擔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卡特對季辛吉與中共交往過程中許多的態度及私下談話不滿，卻讓季辛吉的外交班底繼續在對華政策上效力，例如曾任國務卿的海格(Alexander Haig)、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何志立(John Holdrige)等人。由於季辛吉可以和他們隨時交換意見，所以一直到 90 年代季辛吉對美國對華政策仍有著影響力。卡特政府自 1977 年起已將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列為重要的戰略目標，儘管與中共關係朝向正常化，但仍舊將台灣的安全列為最重要的考量，他指示布里辛斯基不要對中共卑躬屈膝。美國當時的外交政策仍以對蘇關係為重心，不過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卻逐漸被重視。美國和中國建交主要的考量，是在改善亞洲的安全環境，並且可以拉攏中國防止蘇聯，中共提出的條件就是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必須做出遵守「一個中國」的承諾。

美國遂接受中共的建議亦即斷交、廢約、撤軍三個條件，在不損害台灣的安

全考量下，美國確定與中共完成關係正常化。卻因為巴拿馬運河條約送參院審議在即，基於國內政治利益的考量，副總統孟岱爾(Walter Mondale)力勸友好中共行動必須謹慎，以免引發對台灣友好議員的反彈。美國一方面與中國建立正常關係，一面也希望中共明示或暗示放棄對台動武，甚至美國還和台灣維持「非正式」關係，此舉已牴觸中共的主權原則部份，中共公開呼籲美國接受建交三原則。

隨後中共便邀請共和黨的布希、貝克(James Backer)以及李潔明(James Lilley)訪問大陸以對卡特施加壓力。1978年初美國國會參議員甘迺迪(Edward Kennedy)及克蘭斯頓(Alan Cranston)鼓吹美國應與台灣斷交，與中共建交，這樣的公開談話在美國已漸漸形成主流意見，這顯示美國內部對主張犧牲與台灣關係以便與中共建交者已越來越多(沈劍虹，1982：185-187)。這時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都讓中國領導人抓住時機，由於中越關係急劇惡化，蘇越又簽定了同盟條約，中國已在考慮對在邊境不斷挑釁的越南採取懲罰性的有限反擊。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牽制蘇聯，中國需要加強同美國的關係。

(二)新形勢下全方位外交時期(1982-1993)

進入 80 年代後，中共雖然與美國建交，不過卻沒有在中美共同反蘇上有更進一步的積極行動。冷戰結束後，中國外交所必須要面對的是一系列的新課題，中國需要做出一個適合中國的抉擇。其中最重要的是對蘇聯東歐的變革，中國如何做出回應、中國該如何走下一步？蘇聯東歐改變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在意識型態上不再堅持走社會主義路線，甚至揚棄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從軍事安全的角度看來，蘇聯解體後，中國邊境甚至國內來自蘇聯的威脅可以暫時有一和緩的時期(曲星，1999：14)，這是中國國家安全處於自 1840 年以來最好的一個時期。中國潛在的軍事威脅仍存在，美國在中國周邊的部署讓中國不得不小心翼翼，特別是與日本重新修訂防衛關係，與澳洲加強軍事的合作，這些在中美關係良好的情況下對中國得威脅不會顯得很強烈，一旦中美關係出現逆轉，那麼中國的戰略位置將會變得嚴峻。

中國的外交政策在此一時期中最重要的是聯美反蘇，不過在與美國的關係上，中國最重視的還是台灣問題，然而美國在此時期對台灣的关系上卻還是提出了《台灣關係法》，對台灣方面提供軍事武器，使中共拉開與美國的關係，中共認為美國方面是將台灣當成美國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對台灣問題的干涉，讓中共對美國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

中共在 1982 年之後改變對蘇聯的態度，不再集中反對蘇聯，而是漸漸的尋求與蘇聯改善關係，並且要求蘇聯改善中蘇關係間的「三大障礙」，即：1.蘇聯須自阿富汗撤軍；2.在中蘇邊境減少軍事對峙，包括蘇聯由蒙古撤軍；3.促使越南由柬埔寨撤軍(謝益顯，2000：348)，這些都是中共對蘇聯關係疏遠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共認為，蘇聯在這些地方的軍事行動對中共的周邊安全構成了威脅，進而對中共本身造成了壓迫。蘇聯明白自身的處境與國際局勢的改變，此時蘇聯的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意識到國際局勢的變化，便開始與中共尋求關係正常化，開始減少這些地方的駐軍。1989 年 5 月，戈巴契夫的訪華正式宣布中蘇關係的正常化。美蘇關係和緩之後，蘇聯內部從 1985 年起所推行的政治改革，對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撻伐聲四起，這一連串的政治連鎖效應在東歐發生。1989 年 4 月起，東歐各國共黨紛紛下台，開始出現了政治轉軌和經濟制度改制的現象，這些現象反過來影響蘇聯。

1990 年 10 月 3 日東西德的合併、1991 年 12 月蘇聯解體，奉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只剩下中共和北韓，國際上原有的東西陣營對抗的局勢已不復見，這給中共帶來極大的衝擊，這些衝擊立即的在中共國內發酵。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的國家發展走向務實不再以意識型態為國家發展主軸。西方國家的工業技術及資金是中共在國家發展時所急需的；同樣地，西方的民主國家也樂於看見在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擺脫以往的社會主義路線、極權的統治方式而走向民主的道路，也希望將民主的思想傳遞到中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知識份子接受來自各國的思想，也將國內的菁英份子送到外國學習各項進步的技術。中國這個時期的思想

是較毛澤東時期開放，接受非社會主義的程度是以往所不能比擬的，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集權政治體制的正當性、合法性有所懷疑，因而發生了 1989 年「八九民運」。

「八九民運」的發生，是由於社會、政治及經濟因素所造成的：

1. 農村包產到戶使農場規模變小，以致農民收入到 1989 年停止成長，鄉鎮級的企業又無法升級擴編，不能吸收過剩的農村人口，城市居民所擁有的社會福利比起農村來得優渥，加大貧富差距。
2. 中央為了補助不斷虧損的國營企業、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對輕工業的補助增加，造成財政赤字逐年增加、通貨膨脹快速，引起人民的不滿。
3. 中共的法治觀念始終無法貫徹，缺少法律體制的情況下，中共的社會上普遍充斥著貪污腐敗，特別是發生在基層幹部上，甚至在改革開放之後所形成的一個特殊階層「太子黨」這種現象更是明顯。
4. 政治鬥爭嚴重，元老派的不少人士對於改革開放持不贊同的意見，認為改革開放違背社會主義道路，李鵬與趙紫陽之間的齟齬不斷加劇當中。
5. 改革開放之後，港澳人士每年進出大陸有七、八百萬人次，加上 1987 年之後台灣開放對大陸探親，增加了大陸人民的視野、也開放了大陸人民的觀念，以及對境外生活方式的嚮往²¹。

1989 年春天，主張改革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死，讓推動開放的人士集合天安門悼念胡耀邦而集結在天安門廣場，要求中共中央推動民主的改革。新任總書記趙紫陽同情學生到廣場探視學生，但李鵬等元老卻對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要求視為企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決定以強硬的軍事手段鎮壓「反革命暴亂」。當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時，透過衛星的轉播傳送到世界各國，讓各國的人民目睹這場鎮壓，各國對於中共這種血腥屠殺共同發表強烈的譴責。其中美國總統布希 (George H.W. Bush) 發表五項制裁措施，包括立即停止對中共一切政府間的軍售

²¹ 此段部分觀念來自胡為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131。

及商業性軍售，並暫停兩國高層軍事人員交流和軍事合作項目等。這樣的制裁對美國和中共來說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中共失去了軍事現代化的支援；美國則因為中斷軍事的交流造成不小的經濟損失，但是布希政府並不希望與中共斷交，這是基於經濟上及戰略安全上的考量。美國不願意破壞與中共的關係，讓中共再次與蘇聯聯合。因此布希期望私下與鄧小平溝通，讓中共官方的鎮壓行動停止，鄧小平拒絕與布希通話，反而加強鎮壓。鎮壓行動沒有因為美國的制裁而停止，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歐洲共同體、國際特赦組織等均強烈譴責中共暴行，參與制裁中共的國家包括加拿大、紐、澳、日本、歐洲共同體等國。這些國家都是中共對外開放後國外資金及技術的主要來源國家，中共的鎮壓行動引起的國際連串制裁行動，讓中共國際形象及地位一落千丈，在中共經濟開放及發展上停頓下來，甚至連觀光收入也降低(陳有為，1999：118-123、189)。

1989年10月，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鄧小平會見尼克森說到：「西方有些人要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指出「八九民運」是中國的內政，希望美國不要在這個事件上涉入太深，更不要因為這次事件而破壞兩國所建立的關係，但是中共也不會主動乞求取消制裁。這是中共自改革開放後在外交上遇到重大的挫折，鄧小平同時明白的和尼克森說到：「中國將繼續實行改革開放，道理很簡單，不搞改革開放就不能繼續發展，經濟要滑坡，走回頭路，人民生活要下降」(鄧小平，1993：331-333)，他對恢復中美關係有信心，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1990年，錢其琛在美國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中，布希會見錢其琛時表示不希望中美關係持續惡化下去。布希不希望在處理伊拉克戰爭的同時還要分心在另一個戰場上，因此希望中美關係逐步改善，直到恢復雙方高層領導互訪，也感謝中國在伊拉克問題上和美國的合作。這次訪問打破自1989年6月以來美國中止與中國高層互訪的制裁(錢其琛，2003：96-107)。美國的工商界一直將開放後的中國視為廣大商機來源，中國正在發展現代化工程需要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更需要開拓對外市場，中國和美國各取所需，在中美貿易中美國對

中國投資持續增加，尤其是在 1971-1989 年這一段時間中，中美經貿關係已經成爲中美關係更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特別可以由(表 3-2)的數據上得知，中國與美國在經貿的金額迅速增加中，中國輸往美國的貿易金額正在增加中。

表 3-2 1971-1989 年中美貿易(美方統計數字) 單位：百萬美元

年份	美國輸入中國	中國輸入美國	總額	貿易平衡
1971	0.0	4.7	4.7	—4.7
1972	60.2	32.2	92.4	28.0
1973	689.1	63.5	752.6	625.6
1974	806.9	114.4	921.2	692.5
1975	303.6	157.9	461.6	145.7
1976	134.4	201.5	335.9	—67.1
1977	171.3	200.7	372.1	—29.4
1978	820.7	324.0	1144.6	496.7
1979	1724.0	592.3	2316.3	1131.7
1980	3754.4	1058.3	4812.7	2696.1
1981	3602.7	1865.3	5468.0	1737.4
1982	2912.1	2283.7	5195.8	628.4
1983	2176.1	2244.1	4420.2	—68.0
1984	3004.0	3064.8	6068.8	—60.8
1985	3851.7	3861.7	7713.4	—9.9
1986	3105.4	4770.9	7876.3	—1665.5
1987	3488.4	6293.5	9781.8	—2805.1
1988	5022.9	8512.2	13515.3	—3489.3
1989	5807.4	11988.5	17795.9	—6181.0

資料來源：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72-2000)下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4年，頁141-142。

1980年中國通過中美雙邊貿易協定取得第一次最惠國待遇，發生「八九民運」後，美國國會開始討論是否應該延長對中共的最惠國待遇。布希持續延長對中共的最惠國待遇，他說不願意孤立中國，應該讓中國走入世界，布希以自身任職中國的經驗，深知中美關係之中所隱含的戰略意涵。一旦孤立中國，讓中國再度回到過去的制度，美國對中美關係的努力將付諸流水。若國會執意要將制裁法律化，那麼以後必定還要面對重重的立法問題才能夠去改變對中國的關係，基於美國國家利益，布希對國會的壓力提出了與中國全面接觸(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政策，這對日後的中美關係的發展成為相當重要的基礎，同時也成為鄧小平制定對台政策中的重要因素。

三、鄧小平的對台政策

1978年後的中國外交持續著「三個世界」戰略，國際的局勢邁入冷戰結束後的和平氛圍，中國的領導人也希望藉和平的契機發展中國。因此1980年鄧小平提出了中國人民在80年代有三件大事，即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在實現祖國統一上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一國兩制」涉及了國內問題，也涉及到對外問題，因此正式將「一國兩制」做為一個政策。

(一)「三通四流」和平統一時期(1979-1983)

鄧小平上台後，在對台政策上不再使用解放一詞，這是中共對台政策自毛澤東時期以來較溫和的階段，充分的表現出善意。因鄧小平是個務實主義者，了解國際情勢、中國發展的重要已不容許中國再次啓動戰爭。如果中國發動戰爭勢必對中國正在發展的現代化有所阻礙，1978年12月15日，中共正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鄧小平談到台灣工作，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完成祖國統一。台灣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外國投資不變、軍隊變成地方武裝(謝益顯，2000：335)，這樣的構想公開的出現在1979年元旦《告台灣同胞書》(附錄三)和

鄧小平訪美時的講話，在 1982 年 9 月時正式的以「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來表述。

1978 年 12 月 15 日，華府與北京雙方達成關係正常化的共識。美國宣布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且「認知」(acknowledge)中共當局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共方面在 1979 年元旦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後，宣布自即日起停止對金門列島的砲擊。呼籲兩岸共同來商談結束雙方軍事對峙狀態，更加希望在共創台海安全的前提之下，雙方展開友善的關係，促進兩岸的三通(通商、通郵、通航)與四流(科學、體育、文化與經濟交流等)。鄧小平展現了對台政策的「和平」基調，主張與台灣方面改善自毛澤東以來的軍事對峙關係，不再出現「血洗」台灣的字眼，甚至在接受《洛杉磯時報》訪問時，談到願意與蔣經國商談關於兩岸和平統一的問題。鄧小平的談話一出後，中共高層紛紛有共識，在台灣問題上以「和平統一」為原則。

台灣方面在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後，緊接著又在 1979 年與美國斷交，可以說是遭遇空前的外交低潮。儘管美國與台灣斷交，卡特卻對美國國會提出《台灣授權法案》，即《維持美台關係的綜合法案》，主要內容有三項：1.以後提及 Foreign Country、Nation 和 State 等將包括台灣；2.容許美國政府機構支持「美國在台灣協會」；3.授權給「美國在台灣協會」撥款。卡特所提出此修正案的基礎是建立在與台灣的非正式關係上，卻做出對台灣安全上某種程度的保證，並且合法的售予防衛性的武器。美國反對任何以武力或其他手段危害台灣人民安全與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肖元愷，2001：193-195)，雖然台灣在名義上失去了與美國的正式關係，但台灣卻也已經得到所需的東西，那就是台灣若遭到攻擊時美方承諾會予以支援及繼續軍售台灣。

美國國會修定與台灣關係的法案時，是將美國的國家利益置為優先考量要件，台灣的戰略位置對美國而言是與日本、韓國形成防衛西太平洋的重要戰略位置。加上台灣經過長期的建設及發展，在經濟上有卓越的表現成為美國第七大的

貿易對象，如果失去與台灣的經貿關係對美國來說，恐將造成國內經濟的問題。在經過一定的修正後，台灣與美國的關係成爲了非官方(unofficial)的關係，台灣成爲了「台灣當局」(Taiwan Authority)，在 1979 年 4 月 10 日卡特簽署了《台灣關係法》。中共認爲《台灣關係法》的簽定是美國繼續干涉中國內政，由立法上對台灣重新的承認，將台灣再度納入美國的保護之下。中共曾經向美國提出抗議，抗議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鑑於中共國內正發展「四個現代化」建設，需要外來資金技術，在外在形式上也受限蘇聯勢力的壓迫，故實際行動上不會持續與美鬥爭。

爲了進一步闡明解決台灣問題，以及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同時也不讓外國勢力有機可趁。中共於 1981 年 9 月 30 日中共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對於台灣問題的談話，這就是俗稱的「葉九條」(附錄四)。《告台灣同胞書》與「葉九條」在對台政策上都強調解決台灣問題必須基於和平統一的路線。爲了達到這樣的目標就必須透過談判，在《告台灣同胞書》中關於談判是由中共政府與台灣當局對談，到了「葉九條」時已改爲由國共兩黨的對等談判，這可以體會出中共已經釋放出友善的氣氛。葉劍英所發表的「葉九條」成爲後來鄧小平實行「一國兩制」政策的基礎，冀望透過「三通四流」促進雙方的交流，增加兩岸之間的互動，減少彼此的歧見。

美國卡特政府因爲伊朗使館人質事件威望大損，國內又面臨經濟上的通貨膨脹，而輸掉總統連任選舉。1981 年雷根當選美國總統，台灣對於雷根寄予厚望，認爲雷根是強烈反共人士。雷根甚至在競選期間曾說，如果當選要恢復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官方關係」，中共方面至爲緊張，然而事實的發展卻非如此；雷根政府事實上是美國與中國關係最密切的一段時期。中國基於國內正在發展現代化，不願意在此時破壞與美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係，因此中共並未對軍售及「台灣關係法」做出太過激烈的反應。俟 1980 年，中共開始遊說美國接受三項條件：1.廢除「台灣關係法」；2.停止軍售台灣；3.促使台北與北京進行統一談判(沈呂巡，

1986：89)。在停止軍售方面，美國迫於國內經濟需求與中共的壓力下，最終與中共簽訂「八一七公報」(附錄五)。美國雖承諾逐步減少對台軍售但仍會將武器售予台灣，鄧小平被認為是務實主義者，因此他清楚的知道，在台灣問題上關鍵的是取決於美國的態度。因此在對台政策的制定上，必須以中國整體發展與和將美國的因素考慮進去。中共在鄧小平時期，積極的修正毛澤東的發展策略，務求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帶動中國整體的發展。在鄧小平成立經濟特區後，主要在吸引外資的進駐中國，在積極發展的背景下，中共乃於 1982 年黨十二大時決定三大目標「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祖國統一，反對霸權(美蘇)」，並且揭櫫「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輯，1987年：18)，就是中國對外全面開放，不但對社會主義國家開放，也對資本主義國家開放。

(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主張時期(1983-1993)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主政時期對台政策的重要主張，「一國兩制」政策的實行非僅對台灣政策而已，更具有政治上的意涵。具體的實踐是在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而香港的「一國兩制」的實行，成為中共對台政策實行「一國兩制」的指標。

有關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政策下解決有關台灣問題的構想，最早是在毛澤東時所提出的「一綱四目」，毛澤東擘畫出一國兩制的雛型。爾後，在葉劍英所發表的「葉九條」的主張中，在第四條中所指出「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一國兩制」概念提出時只涉及實務層面，單純只為了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並沒有理論可言，更談不上體系架構(張煥卿、段家鋒、吳玉山，1991：263)。

1979 年元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提出《告臺灣同胞書》後指出：「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在解決

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並建議兩岸恢復通商、通郵、通航。雖還沒有明確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但思想已經清晰可見，特別是鄧小平的幾次談話講的更清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不提「解放臺灣」了，連「和平解放」也不再提。這是中共對台方針的重大變化。

後來葉劍英所提出的主張更成為「一國兩制」政策的基礎，基本構想也已經形成。從1984年10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十二期《瞭望》週刊發表的鄧小平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文章為標題，是「一國兩制」構想在1982提出後，所做出的全面具體闡述(張虎，1996：16)，將「一國兩制」構想進一步系統化和理論化。1984年9月以前，中英正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實際是以「一國兩制」原則應用於香港。因而在這段時間內，鄧小平曾多次就「一國兩制」問題發表談話，在這些談話中，鄧小平特別強調說：「一國兩制」構想是「從中國的情況出發考慮的」，「尊重事實，尊重實際，就是要尊重香港和臺灣的歷史實際」。又說：「一國兩制」構想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並非權宜之計，把「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與香港問題相結合後，它就又變成有理論指導和政策指導的實踐了(蔡娟，2003：210)。

從1984年12月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署開始，並以1990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後，是「一國兩制」構想由理論走向實踐的重大步驟和體現。中共在對台政策上更有了一個可以依循的具體事證，整個中方與英方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和立法過程，是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關於「一國兩制」構想在理論上的闡述和發展過程，也是這一構想首先在香港和澳門逐步走向實踐的過程。香港問題具體的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訂立之上。1990年4月4日在第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式通過，香港回歸塵埃落定。中共高層將香港的回歸視為祖國統一的試金石，中共將「一國兩制」當成是和平統一祖國這一戰略方針的重大發展、戰略方針的核心內容。「一國兩制」的提出，使得中共不再將和平統一當成理想，而是可以實行的一個政策，

香港可以做到，同樣的可以適用在台灣問題上。

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是以一個中國為原則，希望兩岸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化解兩岸歧見，即同中有異。特別是在 1987 年 7 月 15 日中華民國正式解除長達 39 年的戒嚴令，政策上的鬆綁，讓兩岸的接觸交流由過去的不合法，到政策上開放探親，兩岸之間開始有了民間的交流。在經濟部的同意下開始了間接貿易，這些兩岸之間的交流都是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進行。鄧小平在雷根訪問北京時，很清楚的說明了對台政策上是以「一個中國」原則為基礎，不希望美方給予台灣過多的聯想。雷根也明白的告訴鄧小平美國對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立場是不會改變的，任何試圖以軍事手段解決大陸與台灣爭執的做法，都將對中共與美國關係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也希望美國政府能協助中共也以「一國兩制」模式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1987：50-51)。惟美國方面並不願意在兩岸關係中當調人，使得鄧小平的計畫胎死腹中。鄧小平在之後更提出對「一國兩制」政策具體化的「鄧六條」。1983 年 6 月 25 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進一步闡述了實現臺灣和祖國大陸和平統一的六條具體構想(簡稱「鄧六條」)(附錄六)。鄧小平提出更加具體的內容，在對台政策上仍然不希望美國的介入，鄧小平藉由六點聲明的發表，試圖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因為中國的統一是一國兩黨的共同願望，鄧小平期望以政黨交流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1984 年，中國成功的與英國達成 1997 年香港回歸的協議，鄧小平宣布「一國兩制」理論是統一的基礎。正如中國允許香港在 1997 年以後的 50 年裡，保持其社會經濟制度一樣，中國也將允許台灣與大陸統一後保持其政治、社會、經濟制度。然而台灣方面，卻覺得這樣的方式並不是台灣人民所希望的，況且台灣與香港的情況不能夠相提並論，對「一國兩制」的政策不認同。在 1988 年蔣經國去世後，李登輝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對中共這樣的對台政策更是不表認同。兩岸對一個中國的看法一直存在著分歧，大陸發生「八九民運」之後，台灣更抨擊中共的政治體制是台灣人民所無法接受的。

1989年「八九民運」的發生一般認為是老人政治的心態，是由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政治鬥爭所引起。「八九民運」中，趙紫陽表現出對學生示威活動的寬容與同情。趙紫陽作為改革與現代化的倡導者，是希望將共產黨引向更大程度的開放。他與總理李鵬與元老派的陳雲、楊尚昆對應該如何處理學生運動產生矛盾，強硬派的人士企圖在學生擴大示威後，將同情學生的趙紫陽拉下政治舞台(徐中約，2002：963-968)。鄧小平等元老為了保住其政治權力不惜放手一搏。對於處理的方式，鄧小平宣布他不怕國內外輿論，也不懼任何對抗中的流血犧牲。鎮壓事件發生不久中共中央隨即封鎖真相，並開始對於在中國境內的各國新聞有所箝制，中共中央電視台對外報導從未發生過屠殺事件。「八九民運發生後，鄧小平在國際社會紛紛對中國制裁之際，開始考慮到自己的去留。決定辭去所有的職務，「以後，當中央領導集體就重大問題徵詢我的意見時，我也始終尊重和支持中央領導集體多數同志的意見。但是，我堅持不再過問日常工作，並一直期待著儘早完成新老交替，實現從領導崗位完全退下來的願望」(小島朋之，1996：56)，鄧小平由中共中央領導班子退下來與「八九民運」事件不能說沒有關係。

第三節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時期中共對台政策的變化

中共自建立政權後，兩岸開始了政治上的分治情形，中共將統一視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最終目標。中共在制定對台政策上，除了考慮中共本身的國家發展之外，還必須考量到對外的國際局勢，自毛澤東時期的以「武力解放」台灣到「和平解放」台灣，皆提及到解放。但在毛澤東時期的國際局勢是處於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東西陣營相互對抗的冷戰時期，加上中共所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並且以蘇聯的共產國際為指導，自然而然的對於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及民主制度有著敵意。國際政治的東西對抗，讓毛澤東選擇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站在敵對的位置，毛澤東深覺內外環境的困難，與轉變非當時中國所能夠相抗衡，因此暫時將台灣問題擱置下來。到了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時期，國際局勢有了轉變，

至國際上普遍希望和平的態勢下，各國不再以戰爭為主要訴求，取而代之的是經濟的發展。中國時值推行「大躍進」政策，「大躍進」使得大陸經濟停滯，連帶著國家發展也進入停頓狀態，中國並不如毛澤東所期望的，毛澤東隨後所推行的文化大革命更令中國的經濟向後退。鄧小平在文革中體驗到這樣的災難，故而在重新回到政治權力核心後，鑑於中國經濟的百廢待舉，便主張改革開放。鄧小平本是務實主義者，一切都以國家發展為最終目的，致使對台政策的制定亦復如此。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提出「三通、四流」的主張，便是考慮到中國需要改變，中國的改變必須藉助外國先進科技與資金，同時因中蘇關係的惡劣，使得中共必須藉助美國的力量，幫助中國再次回到國際社會中。正因為中國國家發展策略，在對台政策上趨向和緩，不須特別強調「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更進一步的在1982年提出了「一國兩制」，至此對台政策有了大幅度的轉變，進入一個務實的階段。

由毛澤東到鄧小平時期對台政策的轉變是，由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掛帥轉變至鄧小平的以國家發展為主，分別說明：

一、意識型態掛帥

中共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延續，中共不需要由美國等外國勢力來干涉中國的內政問題，況且在共黨理論中認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無法並存的。在1949年之後，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讓毛澤東認定美國干預中國內政加上多次美國出兵韓國、越南等其他國家的例子看來，毛澤東認為對台政策的制定在美國的干預下，中國勢必失去主權與領土統一的機會，而中國主權與領土的統一正是中共不會改變的原則。

毛澤東在馬列主義的意識型態指導下，在中國大陸內部發動批判與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否定資本主義的一切，可以由(表 3-3)中，得到結論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主導政策制定、生活中的一切都離不開意識形態。

表 3-3 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

年代	運動名稱	運動性質
1950.6-1952.12	土地改革運動	經濟
1950-1953	抗美援朝運動	政治
1951.5	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	思想
1951.10-1953.6	鎮壓反革命運動	政治
1951-1953	整黨建黨運動	政治
1951.11-1952 秋	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	思想
1951.12-1952.10	三反五反運動	社會改革
1952-1956	三大改造運動	經濟
1953-1958	農業合作化運動	經濟
1956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	經濟
1956	雙百運動	知識份子
1957.5-1958.6	整風運動	思想、政治
1957.6-1958 夏	反右鬥爭運動	政治
1958-1961	大躍進運動	經濟
1958	人民公社化運動	經濟
1963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城市「五反」運動	經濟、社會
1964	四清運動	政治
1964.2	農業學大寨運動、工業學大慶運動	經濟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運動	權力鬥爭、政治

1966	紅衛兵運動	政治
1968-1969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政治
1968	鬥、批、改運動	政治
1973-1974	批林批孔運動	政治
1975	批「水滸」運動	思想
1975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政治

資料來源：吳安家，《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國史館：台北，2004年，頁51-52。

自毛澤東時代開始，對於台灣問題，即以「一個中國」為原則，不管是對中國國內的民眾或者是對國際上的宣傳，都是將「收復台灣」作為口號及觀念。由50年代的幾次台海之間的戰爭可見，毛澤東對於收復台灣的決心，甚至不惜血洗台灣，可以得知他武力犯台的意圖。一直要到中國國內的「三面紅旗」運動的失敗、「文化大革命」的動盪，加上中共此時與美國、蘇聯的關係都是處於低迷狀態。毛澤東鑒於國內發展局勢的不穩定，中共在外交上的困境，不願此時再興起武力犯台的舉措，因而提出「和平解放」的口號，特別在提出「一綱四目」後，雖然未曾將之落實成為政策，然而毛澤東的「一綱四目」卻是成為往後對台政策最基本的藍圖。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的對台政策主要是：以武力為後盾寄望透過外交及政治上的手段迫使台灣妥協以期達成「和平解放」台灣的最終目的。

二、國家發展為主

1976年毛澤東去世，鄧小平成為中共第二代的領導人，繼之「四人幫」的垮台，中共內部除了政治權力中心的改變之外，更加微妙的變化在於一般人民身上。政治活動上的動員運動經過「文化大革命」浩劫後，已經無法引起百姓們的共鳴，鄧小平知道中國的人民需要什麼，中國的人民此時所需要的不應該是政治的動員，反而是經濟上的動員，要齊心搞好中國經濟是人民的希望。鄧小平為了

適應經濟上的需要，從毛澤東死後並不再把馬列主義奉為圭臬，取而代之的是發展中國為優先目標，要發展必須讓外國的資金、技術進到中國。儘管當時仍舊有些許元老派的人反對讓外國資金進入中國，也引發了「姓資」、「姓社」的爭辯，然鄧小平提出「以實踐檢驗真理」、「不要辯論」的口號，明確的對過去「寧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的看法有所質疑。鄧小平認為中國要走出貧窮並且躋身大國之林，必須要抓住國際政治和平的時機，利用這個機會發展中國的經濟，向資本主義學習。

鄧小平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經濟改革措施²²，提出「防右更要防左」的觀念，推出了「四個現代化」、「農業改革」等一系列經濟發展策略。最主要成功的部分在於簡政放權，讓人民真正可以看到自己辛勤的成果，將中國的發展重心全力放置發展經濟上，加強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借重外資的挹注改善中國的經濟環境。中共在國家發展的大前提下，對台政策上自然是趨於和緩的情況，還必須注意的是此時的台灣經過休養生息，在經濟上創造了「台灣奇蹟」。鄧小平在主張改革開放之際，中國廣大的商機除了對歐美國家極具吸引力之外，對台灣來說，鄧小平更是訴諸文化上、民族情感上鼓勵台商到大陸投資。因而以武力為導向的對台政策逐漸轉向以經濟上吸納、文化上交流的策略來替代以往的軍事手段。

中共在大環境已開發為主的前提之下對台政策由 1979 年《告台灣同胞書》到 1981 年「葉九條」所提出的「三通四流」，可以看出中共對台政策的轉變，少了武力字眼的恫嚇，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當成對台政策的主軸。鄧小平為了要讓中國人民能夠接受資本主義，並且不至於讓人民對中共的主張有所質疑，

²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這條基本路線的根本和關鍵。鄧小平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穩，不能單打一。但是說到最後，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改革開放是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它賦予四項基本原則以新的內容。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就會偏離正確方向；不堅持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就堅持不好甚至堅持不住「四項基本原則」，這就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指出，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題。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 年，第 2 卷，頁 250。

便主張要實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就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鄧小平於是採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對台政策上採「一國兩制」政策。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工商界時說到：「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來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現在已經見效了，所以提出這個方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鄧小平，1997：17-18)」。故在1982年的新憲法第31條中，將「一國兩制」化為具體條文，而成為對台政策最高指導原則。「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以經濟改革為主要戰略思考模式，除了對中共本身國家發展有所幫助外，在對台政策上也是另闢一條，與毛澤東的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不同的，和平解決方式。儘管鄧小平在對台政策上，不輕易的說出以武力犯台，仍舊在最重要關頭會提出不排除武力犯台的可能，自始至終，中共並沒有放棄武力犯台的可能性，所不同的只是依照環境所需來改變策略。

中共在制定對台政策時所考量的是以中國的國家利益為優先，儘管毛澤東時期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會有意識型態主導政策的情形出現。但是到了鄧小平時期，意識型態出現在對台政策制定上已經比較少見，真正的做法就是一切以發展中國為主為政策制定的基本策略，這樣制定對台政策的戰略思維也成為江澤民主政初期制定對台政策的重要依據。